

史學常談

斯維至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930562

1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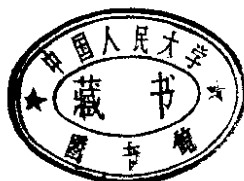
史学常谈

斯维至 著

2022/08



B0093357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史学常谈

斯维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市小寨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5 字数71,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

统一书号: 11094·46 定价: 0.26元

前 言

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和爱好历史学的社会青年，在学习《中国通史》一类教科书的同时，读点古代史籍和原始史料，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在一九六二年后教授《历史文选》课时，除了讲古汉语的知识以外，还讲讲史籍的体例、史学家的思想、新史料的发现，以及工具书的使用等。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过去的人都已经有这样的感叹，现在年青人，即使是学历史专业的，要学习的知识比古人还多几倍，所以，要尽读古代史籍，显然精力和时间都是不够的，而且也未必有此必要。为此，我将一些重要史籍的体例、内容以及一些史学常识，简要介绍出来，供读者参考。至于读什么书，各人可以视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而定。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不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籍，而且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凡是爱好文史者，都值得读一读。培养古汉语的阅读能力，从这几部书着手也最好。至于先秦的史籍，如非专业需要，可不必尽读。

虽然我们不能尽读所有的史籍（即使如本书所介绍的），但是对于一些重要史籍的体例、作者、内容等，有个轮廓的了解确很必要，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在必要时可去找什么书，或怎样读。

读史籍，首先要明了史籍的体例。本书所讲的编年体、

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都是体例问题。所谓体例，就是指史学家著史的目的、观点、以及处理史料的方法。我国史学家是很注重体例问题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自叙中就详细地谈到他的出身、经历和著《史记》的动机、观点及方法等；《汉书》的作者班固在自叙中也同样谈到这些内容。这是我们读《史记》《汉书》全书前首先应该阅读的。我国古书（不止史籍）不一定都有自叙，或明言体例，甚至作者是谁也不清楚，这就要我们应该先下点功夫对作者、年代和体例等进行点研究。

有人认为我国虽然历史著作极为丰富，但是却缺少专门研究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著作。这个看法有一定的理由。不过，如果因此认为我国没有史学理论、史学思想，那就不对了。据说孔子作《春秋》时曾经说过：“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他认为理论是抽象的，不如历史事实“深切著明”，因此，宁愿把理论（空言）寄托于历史事实中。后来，司马迁写《史记》时，也引用了孔子的话。这就说明我国史学家并不是没有史学理论、史学思想，而是他们不喜欢专用“空言”来表这罢了。至子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里所提出的“史法”“史意”，无疑是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此外，今文学、宋明理学中，也有许多史学理论，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是唯心主义而视若无睹。

我国宋代以后开始对于史籍、史料的年代和真伪，提出科学的考证，注意到金石材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极据。至于清代，由于考据学的发达，文字、声韵、训诂、校勘、辨伪、地理、天文等，不但都作为考据的工具，而且它们已发展为

独立的学科。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历史学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当时资产阶级的史学，固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发展的阻力，但是它们在批判封建主义旧史学方面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本书写作的动机，已如前述。回忆我自己年青时初学历史，曾经读过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它介绍《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和《四书》等，与本书体例略同。不过该书偏重于有关古典文学的书籍，而本书偏重于史籍。朱先生的书，虽然字数不多，但文字优美，通俗易懂，我至今忘不了它的启蒙之功。我现在虽然有意学习朱先生的书，并取名《史学常谈》，但是自知修养不深，能力浅薄，故写成之后，只供讲义之用。最近，因受到朋友和同学们的热情鼓励，踌躇至再，终于敢重新修改补充，交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我应该感谢郭子直、黄树葵、冯慧福等同志阅读了我的初稿，黄永年同志最后又阅读了我的清样，有所是正。承老前辈上海图书馆馆长顾起潜先生封面署签，尤为光荣。写作时主要参考了梁启超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著的《中国史学史》等书。因为本书是通俗读物，引用资料均未一一注明出处。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不吝指正为幸！

目 录

古代的史官与史籍·····	(1)
甲骨文与金文·····	(6)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	(12)
汉代的经学与史学·····	(16)
《史记》与《汉书》·····	(21)
二十五史及其他·····	(27)
《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	(35)
竹木简·····	(40)
敦煌石室中的古文书·····	(44)
《三通》与《九通》·····	(49)
刘知几与章学诚·····	(53)
宋明理学与史学·····	(59)
清代考据学与史学·····	(65)
历史与地理·····	(70)
史注与史补·····	(74)
校勘、辑佚、辨伪·····	(79)
类书·····	(85)
纪年、年表与年谱·····	(88)
姓名与避讳·····	(94)
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我国的发展·····	(99)

古代的史官与史籍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已经知道把自己的祖先和英雄人物的事迹编为故事、歌谣流传下来。例如我国彝族的《勒俄特依》，布依族的《盘古分天地》和《开天辟地》等，叙述他们祖先和英雄人物开天辟地、创造世界、繁殖子孙、战胜敌人的故事。其中有的传诵祖先的世系，可以到达四、五十代而不致错误。西盟佤族还保存一种木刻记事的方法，在每年吃新米的时候，照例要拿出历代相传的一段木刻。木侧刻有深口浅口，表示大小历史事件，由老人根据木刻讲述本村历史故事。

我国古书上记载“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瞽、瞍、矇都是盲目的乐人。他们一边唱，一边讲历史故事，和“史献书”的职务相同。相传作《左传》的左邱明就是一个盲目的人。又春秋时晋国有一个叫师旷的乐人，有一部《瞽史之记》，证明他既是一个盲目的乐人，而同时也是史官。

甲骨文中不但有“史”字，而且有“大史”、“御（御）史”，可见我国殷商时期确有史官，并且负责记录和保管典册的工作。至于夏代以前是否有文字，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传说仓颉、大挠是文字和干支的发明者，亦是黄帝的史官。这个传说自不可靠，不过古人认为，史官是文字和干支的发明者，却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了文字和干支，史官才具备了

记录的条件。

西周时，史官的地位更尊崇了。《周礼》中有“大史”、“小史”、“外史”、“内史”、“御史”等，总称为“五史”。铜器铭文中以“大史寮”与“卿事寮”并称，可见大史与卿事是并行的职官。又有所谓“作册”，根据孙诒让、王国维的考证，就是“内史”。因为他们有负责传达王的命令和策命的任务，所以又叫做“作册”。

古代的史官，不但负责记录和保管文书、传达命令，同时还负责祭祀、占卜、观察天象吉凶。我国古书中，常常以巫史、祝史或祝宗、卜史并称，就是这个原故。春秋闵公二年，狄人侵入卫国，俘虏了史华龙滑和礼孔二人。他们对狄人说：“我太史也，实掌其祭”。又昭公十七年发生日蚀，祝史请用币。大史曰：“在此月也”。这都是史官负责祭祀、占卜和观察天象吉凶的证明。汉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曾发牢骚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表现了他是不甘心这样的地位的。

古代的史是官，而且与巫相近，有宗教性职务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史的性质和原始的史籍，是很重要的。

甲骨文和金文，无疑记载了古代的历史资料。《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殷人已有典册了。册、典等字象简册形，因此，殷时的典册应用竹、木制成的，虽然我们尚未发现。甲骨文的发现只是八十年以前的事，春秋后期的孔子似乎尚未见到，所以他有“文献不足徵”的感叹。

甲骨卜辞中，往往在“贞”字之前要加一个字，这个字是史官（也即是卜人）的私名。近人就是根据贞人的私名

断定甲骨文年代的。甲骨文卜辞除贞辞、验辞外，已有日（干支）、月、年（祀）的具体记载。殷人迷信，认为无事不关吉凶，因此也无事不卜。凡王的活动、祭祀、战争、农业、生子、占梦、天象、自然灾害等等，都于卜辞有所反映。因此，我们如果把它按年按月按日编排起来，实际就是一部史籍。读者如果和《春秋经》比较，就会更加明白。比如卜辞：

癸丑卜，贞，今岁受年，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殷契粹编》第896页）

甲午，王卜贞，作余酒，朕棗下酉，余步，从侯喜征夷方……在九月，遯上甲……唯佳十祀。（《卜辞通纂》第592页）

下面再看《春秋经》：

庄公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夏四月辛

卯，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秋大水，无麦苗。

卜辞和《春秋经》比较何等相似，我们即便说《春秋经》是沿袭卜辞体例也不过分。过去有人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创作，由此看来我们就知道那是毫无根据的。

《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史）”的意思。其中《周书·洛诰》中明白记载“王命作册逸”、“作册逸诰”。作册就是史官内史，逸是他的私名，那么，《洛诰》是史官逸的手笔可证。又《顾命》记载“命作册度”，《书·毕命》序“康王命作册毕”，同样可以证明《顾命》、《毕命》是史官度和毕的手笔。今《尚书》中《尧典》、《禹贡》等篇，虽然不是史官的手笔，而是经过后人编写的，不过其中的传说也是史官口耳相传下来的，不能认为它们全是伪造。如《尧

典》中的“四仲中星”，经近人竺可桢以岁差考证，知其确为殷周之际的天文现象。又其中的“四方风名”，由甲骨卜辞证明也是真的。

《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部书，汉人称为“六经”（《乐》早亡，所以只有“五经”），也是历史文献。如《易》这部书，其中卦爻辞中就确有殷周之际的史实。我在前面讲过，古代巫史的职务不分，那么，在卜筮书里有史实，就不奇怪了。

《诗》本是古代的歌谣。如今《诗》中的《生民》、《豳》、《公刘》叙述周建国以前的历史活动，《常武》、《江汉》叙述周宣王向江汉流域的拓土，都起了诗史的作用。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诗》亡然后《春秋》作。”依孟子的意思，在编年史《春秋》以前，只有《诗》才是史籍。我们也认为，在文字发明以前，诗歌中传诵着自己祖先和英雄人物的故事，所以《诗》是史料，更无疑义。当然《诗》中也包括许多抒情诗。

礼本来起源于祭祀，引申之，凡关于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叫做“礼”。如春秋时晋国韩宣子到了鲁国，看到《易·象》、《春秋》，于是叹道：“周礼尽在鲁矣。”这就是说，《易·象》、《春秋》等都是周礼，泛指一切历史文献。当然，现存的《周礼》、《仪礼》、《礼记》，决不是殷周之际史官的记载，而是战国时人或汉人编定的。

其实，不但《诗》、《书》、《易》、《礼》、《春秋》等是史籍，据《国语·楚语》记载，尚有《世》、《志》、《命》、《语》、《训典》等等，贵族把这些史籍用来作为

教学的工具。春秋时不但周王室有史官和史籍，而且列国诸侯、贵族也都有史官和史籍。如鲁有《春秋》，宋、齐、燕、楚各有《春秋》，晋叫做《乘》、楚叫做《檮杌》。

上面所说的《世》就是家谱、世谱的意思。当时如果一个贵族不知道自己的家世，就等于“数典忘祖”，是引以为耻的。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秩序，史官记事有严格的“笔法”或“书法”，而且必须坚持“秉笔直书”的精神。如僖二十八年《春秋经》曰：“天王狩于河阳。”这次会盟原是晋文公召集的，周天子不得不参加，但是史官却仍用巡狩的“狩”字，以示尊严。又宣公二年《经》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本来弑晋灵公的是赵穿，但当时赵盾是正卿，他对弑君是有责任的，因此《经》写做“赵盾弑其君”。以上两例，明明与事实不合，但仍然认为是“秉笔直书”。又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太史照事实写在史册上了，崔杼感到对自己不利，把太史杀了，但太史的弟弟照样写，崔杼又把太史弟弟杀了，太史的三弟又照样写，崔杼无可奈何。当时南史氏听了，怕无人写，便抱着竹简赶去，知道太史三弟已经写了，他才放心。有人认为这是“美化”史官，其实不然。因为史官的阶级立场，无论“笔法”或“秉笔直书”都是鲜明的。他的“秉笔直书”，虽于个别贵族不利，但是对整个阶级却是有利的。

甲骨文与金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公元前一千数百年以前，殷商人已经使用这种文字作纪事和贞卜的记录。这种文字是我们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在此以前，陶器上刻的简单的图形和符号，可能已经是原始的文字，但是对于它的读音和意义现在我们还不清楚。而甲骨文经过古文字学者的考释和研究，可以确定认识的已有一、二千字了，我们可以借此来研究殷商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公元1898—1899年间（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偶然发现一些甲骨碎片，其中有的有文字。农民误认为龙骨，把它卖给药铺作治刀伤的外敷药。后来这些甲骨片被古董商人带到京津，王懿荣首先认出上面刻的是文字，收买了其中一批有文字的甲骨片。当时他任国子监祭酒。“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投井自杀，大部分甲骨遂归于刘鹗，即《老残游记》的作者之手。1903年，刘鹗选择其中较好的甲骨一千多片石印出版，名为《铁云藏龟》。从此，甲骨文字才为世人所见，成了研究古代文字和历史的资料。

1905年罗振玉探知甲骨片的发现地是在河南安阳小屯，便亲自到该地考察，确定安阳小屯就是原来的“殷墟”，即盘庚以后的殷商首都。这样一来，更大大地提高了甲骨文的价值。他搜集了大量的甲骨文和铜器，并陆续编印了《殷墟

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及《殷虚书契菁华》等书。

刘鹗、罗振玉等人曾对甲骨文的传布和搜集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1928年起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其后又连续在该地及其附近进行了十余次发掘，除了发现大量的甲骨片、铜器、石器等重要文物以外，扩大了发掘的范围，从而发现了殷代的宫殿、陵墓等遗址。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重视和关怀下，自1950年到1953年之间，又在小屯附近村落进行考古发掘。在发掘中特别注意殷商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生产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1953年以后在郑州、洛阳还发现了殷商的早期文化遗址。这样就使我们对殷商文化的来源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更加清楚了。近年来，在长江流域也发现了殷商文化的遗址，证明了殷商晚期它们的文化与势力确已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自甲骨文发现以后，罗振玉、孙诒让便开始了对文字的考释。王国维除了考释文字以外，还进而考证殷商的世系、制度和历史。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的世系只有个别的错误以外，基本上与卜辞中所见的世系相符合。他的《殷周制度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商周之间制度文化的不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殷》诸文，又考证了殷商的地理及活动区域。

王国维对于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是卓有成绩的。为什么他能有这样卓越的成绩呢？主要原因是他能够把旧史料（文献史料）和新史料（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他

虽然以第一手的考古资料为主，但是并不排斥文献史料。相反，经他的比较研究，原来被怀疑的史料以至神话传说（如《山海经》等）都得到新的证实和认识。又因为他广泛使用了文字学和实物相结合的考证方法，所以他的结论是科学的，有说服力的。他把这种方法，在《古史新证》里称为“两重证法”，就是新旧史料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他不但研究甲骨文是用此方法，研究金文、竹简和其他史文也是用此方法。因此，王国维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的研究成绩和方法，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称许。

郭沫若同志不但接受了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商代社会。他的《甲骨文字研究》，虽然是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著作，但是并不限于文字，而是由文字推断古代社会。例如他由祖、妣两字推断出商人的祖先崇拜和社祭的孑遗；由臣、民两字推断臣民原是奴隶。他的《卜辞通纂》，分类考察了商代在世系、征伐、食货、祭祀等等，从而得出商代为奴隶社会的结论。

金文就是铸在钟、鼎等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因此也叫做“钟鼎文”。在青铜器上，有时只有一个图画似的族徽或文字，以表示器物的主人，故《礼记·祭统》说：“铭者，自名也。”后来才把“铭”引申为经验教训的格言。

应该指出，在青铜器上铸刻经验、教训、格言是绝无仅有的，更多的是制作器物的主人对自己和他的祖先的歌功颂德和祝嘏之辞（简称“嘏辞”，即祝福之辞），如“用丐眉寿”、“用丐康乐纯佑眉寿，永命令终，万年无疆”等等。

青铜器的使用，主要在殷周春秋时期；战国以后由于铁器已较普遍，青铜器的使用范围才逐渐缩小。两汉、魏、晋

以后，许多实用器物都由漆器、瓷器所代替，所以偶然从地下发现古代青铜器物，就视之为“祥瑞”了。后来出土的青铜器愈来愈多，宋代学者刘敞、欧阳修、王黼、赵明诚、薛尚功等就开始把出土的铜器搜集记录，或摹图形，或加考释，订正名物，并对出土地点、藏器之家等也加以记录，同时他们还注意碑刻的搜集和记录。所以这一门学问又有“金石学”之称。

到了清代，金石学更加发达了，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扩大，凡钱币、玺印、封泥、兵器、车器、雕塑等等都在搜集和研究之列。虽然缺乏科学的地下发掘，却实际奠定了我国文物考古学的基础。

应该承认，真正的科学考古是必须从地下发掘开始的，因为如果我们不知出土器物的地层、坑位，对于它的年代就一定不能作出正确的判定。二十世纪初，一些欧美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尽管他们的目的是在掠夺我国的财富，但是他们带来了科学考古的技术，因此客观上起了促进我国考古技术发展的作用。北京猿人、龙山文化、细石器文化的发现，以及仰韶文化的扩大与研究，都是我国考古学者辛勤努力研究的成果。全国解放后，考古工作的成绩更是旧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关于宋、清两代的金文研究，可以参看王国维的《宋代金文著录表》和《清代金文著录表》。王国维是甲骨文研究的“开山”者，在金文方面也有卓越成就。他写作两表的目的，是想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器名、年代、史实考证等各方面做一新的研究，可惜没有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

郭沫若同志在研究甲骨文的同时，也研究金文。他一再表示自己研究甲、金文的目的在于研究古代社会。就是说，他并不以考释文字为满足，而是要在文字的基础上探求古代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但是，反转来说，如果文字还不认识，又怎么能够知道它的意义，从而探求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呢？郭沫若同志认为现存的《书》、《诗》等，固然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最好资料，但是它们只有部分材料是第一手资料，绝大部分则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而只有甲、金文才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甲、金文虽然是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它们本身有的有年代，有的无年代；有时有年代，却不知属于某王；有时虽知其为某王，却又不知它的年限、起迄，所以还不能贸然拿来应用于研究。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图录》自序中说：

年代之考订则戛戛乎其难。自来学者亦颇苦心于此。其法每专依后代历术以事推步，近时每内外承学之士尤多作大规模之运用，案此实大有可议。盖殷周古历迄未确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异说。

接着谈到推定年代的方法和前者不同。他说：

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猷侯鼎》等皆是。……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极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亦不甚远。至